

知识分子研究

郑也夫著

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读书界一向颇受瞩目。本书作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涉足这项研究的学者之一。在那个题目和那批学者中，这部作品其实是第一茬早熟的葡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它几乎成了上个夏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它留下

社会学家 郑也夫作品系列

的是对那个热情如火的年代的一份记忆。

中国青年出版社

知识分子

■ 郑也夫著

研究

社会学家 郑也夫作品系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研究/郑也夫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郑也夫作品系列)

ISBN 7-5006-5514-2

I. 知... II. 郑...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06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35821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25 印张 200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前　　言

这篇“前言”，实为“后记”。

本书上编完稿于 1988 年 4 月。下编除《大学与知识分子》一文为出席哈佛大学会议写于 1996 年夏天，其余陆续完成于 1988 年底至 1992 年。

上编在写作时是按照一部独立的专著体例进行的，固仍保留其完整性，不掺杂其他文章。下编则不同，多数是在无整体计划下陆续写出的。写完上编后，我曾拟写作一本《书与知识分子》。在完成了其中三章“符号、书与知识分子”、“书籍出版的历史与现状”、“图书馆的社会学研究”后，资料难寻且兴趣衰减，原拟写作的“图书审查制度的社会学思考”、“图书销售与传播”等均未完成。这三篇论文与其他零散写出的围绕知识分子问题的四篇文章一同放入下编中。下编与上编享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聊以自慰的是下编以其散漫为略嫌拘谨的上编拓宽了一点视野。故编在一本书中，名曰《知识分子研究》。简述如下。

第 1 章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取广义的定义，我的理论定义是“频繁地使用某种特殊符号系统的人”，操作定义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深知这一词汇在人们理解与表述中的巨大歧异。固然每个学者都有定义的权利，并不统一却有创见的一个个定义也确实给人们以启发，但我们毕竟要保证交流的畅通。因此本章第二节“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既为划分类型，也

为澄清广义与狭义之区别；我的广义观视他们为不同类型的的知识分子，而狭义的定义可能会视其中某些类型为非知识分子。其实有时分歧只是称呼。称呼不是大问题，要紧的是对社会中与教育和文化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关系的各个群体都作出清晰的界定和密切的关注。

第2章从两个方面反省思想改造运动。第一，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民粹思潮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这种思潮带有文化虚无主义的味道，它使得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对劳动人民有罪，需要改造。第二，政治家在革命运动中需要统一思想和意志，而在政治实践中“统一”极易转化为“单一”的追求，知识分子无疑是单一思想的障碍，因而屡屡成为政治运动的对象。在第四节比较了知识分子与大众在道德上的高下，批判后者在道德上高于前者的论调。

第3章结合概念与历史，提出并分析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五种关系及各自得失：第一，官学一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路；第二，学者知识分子从政——为罗斯福设计新政的智囊团；第三，权力机构之外的改良家——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第四，持不同政见者；第五，知识分子革命家和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最后讨论了官僚与学者的沟通。

第4章从五个方面讨论为什么知识分子往往带有批判精神。第一，不满是人的本性，而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不满”的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们往往将其与一种理性的批判相结合。第二，传统社会是一个发展缓慢的、同质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变迁剧烈的、异质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决定了知识分子特征的不同。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为社会提供共同意识和社会规范的，而现代社会中的多数知识分子是从事生产和科学的研究的，后者决定了他们是思变的，不守成规的。第三，现代知识分子或

从事科学的研究，或受到科学的浸染，而科学的本质是怀疑精神。第四，多数知识分子生活在符号而非现实的世界中，符号世界所要求的尽善尽美促使他们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第五，但是与此同时，当代社会中的分工化与专业化也极大地扼杀了知识分子对超越专业的社会事物的关心与批判。

第5章“我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构成和分布”。该章用数字资料从“大专以上毕业生数量”、“留学生数量”、“知识分子的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知识分子年龄与性别”、“中共党员中知识分子比例”等九个方面作了描述。原文完成于1987年，1992年时作了修订，用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取代了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字。这几乎是本书上编中对原稿作出的惟一修订。但未能更新本章全部数字，请读者谅解。

第6章在解释了“代沟”的社会学内涵，主观地裁定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后，从教育与知识结构、经历与性格、目前的地位与作用三方面比较了三代知识分子：“老一代”——1949年以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解放的一代”——1950~1965年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文革’和下乡的一代”——“文革”的学生中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

第7章讨论“脑体收入差距”。第一节引述张仲礼的研究，清代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均收入的差距大约13倍（不算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活动）。第二节根据调查研究推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差距仍然是13倍。第三节阐述了自1949~1985年脑体收入差距的变迁——从50年代脑力劳动收入略高于体力劳动，到60年代两者大体持平，再到70年代末叶两者逆转。第四节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探讨一些理论问题：提出“报酬不均等的必要性”，它可以刺激对短缺的、必要的需求的满足；提出“鱼与水”的理论——工程师（鱼）离不开教师和科学家

(水),前者可以进入市场,由市场决定其收入,后者却不可能进入市场,只能依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本章完稿于 1988 年初,并于 1991 年 1 月公开发表。应该说这一选题本身就受到那个时代的特征的影响:知识阶层有较强的同质性,收入来源同一,社会经济生活市场化程度低。而自那时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市场化,曾经比较同质的知识阶层也迅速分化。其后,我多次表示,在研究与政策制定中不应再笼统地讲知识分子的收入,他们已经大大地不同了,要分别地、具体地看待:教师的收入如何,科学家的收入如何,工程师的收入又如何,政府要对谁负责。如果今天继续做这类选题,题目将是“教师收入研究”,甚至“中学教师收入研究”、“大学教师收入研究”,等等。

第 8 章是一种展望式的理论思考。内中的乐观情绪只是表象或在理性的意义上。即使我所展望的社会真的来临,我料定其中的问题也将纷乱如麻和困惑费解,其面貌也一定令那时的人们不满和无奈。因为从根本上说,我对人类社会持悲观的态度。

至此上编结束,自第 9 章起为下编。

第 9 章是读《知识分子与传统》(Eisenstadt 编)一书后的思想。我应该算做较早地从反传统的潮流中脱身,且反思和杀过回马枪的人。1988 年 10 月 28 日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反传统之反省》。这一章是我的这一思考在碰撞到域外学者的相似观点后的延续。我的主张如本章结语:“脚踏实地,生长渐进,既有谦虚地看待传统的态度,又怀抱创造的雄心。”

第 10 章,“皮与毛”的理论盛行之日,正是知识分子的尊严终结之时。为什么会如此?“皮与毛”的理论是阶级社会学的通俗读本。阶级社会学认为阶级在社会历史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进入这一理论就会发现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因而无足

轻重，必须依附别人。阶级社会学虽然有其巨大的价值和解释力，却也有重大缺陷。在社会与文化两大因素中它过于强调前者，忽视了文化对历史与现实的巨大作用。它只判定知识分子不是阶级，没有讲清它是什么。实际上正是因为很多知识分子“相对”较少受阶级关系的束缚，并且受过更多的教育，因而能够对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利益有更全面的理解。

第 11 章包含以下观点，第一，因为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繁荣，而社会富足是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前提之一，所以市场可以间接地对知识分子有所帮助。第二，但是在直接的意义上，市场与文化却可能是对立的，两者的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只有一小部分文化可以进入市场，市场不理会纯科学和义务教育。第三，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应该并存着三个相互独立的系统：政治、市场、文化。任何一个系统的价值观都不可以高度膨胀，吞噬掉其他的价值。而任何一个系统又都不自觉地企图膨胀，市场也正是这样。支持教育与科学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本章还探讨了知识部门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第 12 章的前两节进一步阐述第 1 章的观点：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知识分子是使用某种特殊符号系统的人。第三节提出：书写符号、衬体、使用者，是文化传递与发展的三大要素。而几乎每一种衬体都与一个特定的知识阶层，甚至一种文化相联系；比如纸草与埃及祭司，甲骨与“巫、卜”，竹简与史官，纸张与书生和科举制。衬体的领先（先是竹简，后是纸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文明领先于世界的最主要原因。

第 13 章继续上一章关于“衬体与印刷手段”的思想，讨论书籍“种数”。在 1450 年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前的全部历史中，中国书籍种数略多于整个西方（1:0.73）。1450 ~ 1600 年，中国与西方书籍种数之比变为 1:89。印刷术所造成的中西信息

产量与储量之势态逆转，早已决定了 19 世纪中叶中西碰撞的结局。在第二节分析了 20 世纪中国与世界书籍出版种数。第三节讨论了 1949 年以后中国书籍出版的种数、印数。第四节讨论了当前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困境和问题。

第 14 章，书写符号是为了记录和储存口语中的信息的，书籍是为了储存这些书写内容的，图书馆是为了储存书籍的。符号、书籍、图书馆，其内在逻辑一以贯之。本章比较了中西古代图书馆，并描述和分析了今天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和问题。

第 15 章的第一节讨论“学历社会的合法性”。学历社会是当代世界性趋势。中国古代是最早建立学历社会的国家，但有其局限性：一、当时教育远未普及；二、科举覆盖的知识范围狭小；三、在抑制身分世袭的制度选择中市场有同样的功能，可是在中国古代市场受到贬抑。在今日人们的社会定位上应该学历与市场并行。商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运气，运气无从琢磨，因而学历更可靠，必不可少。第二节“大学，知识分子的社区”讨论了以下问题：一、大学是最适宜知识分子生存的地带——便于交流，免除市场压力，工作制度化；二、人文与科学在今日社会上日益隔膜，挽救这一危机的工作首先应从大学做起，大学应成为各类知识分子全面交流的社区；三、全球化造成利益交织可望超越和消解民族与地域的冲突，而全球化商业活动的展开需要了解其他民族的人才，大学应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学者交流的场所；四、大学较之研究院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在于前者拥有青年学生，保有知识分子的代际交流，这对长者与青年均好处莫大。

以上是本书简述，希望它能给予读者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观。

尽人皆知，这十年，甚至五年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即使笔耕不辍尚且追不上剧变的社会，写于五年、

甚至十年前的文章自然带有上个“时代”的一些印迹——无论是观念、材料，还是思想方法。但我深信，一个肤浅的思想自其产生起就是垃圾，而那些经过认真反省的思想产物在严酷的时间面前也只是“相对过时”，其硬核不会随风而去，因为它不是梦游者和弄潮儿。“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往的思考具有其独特的、难以替代的意义。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其中的某些部分应该走入“社会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者的轨迹和坐标；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其中很多内容似乎仍可“参与”到今日的社会生活及其话语之中，不作清高壁上观。

书中谬误敬请读者指正。

写于 1997 年 8 月 20 日

北京南礼士路住所

目 录

前言 1

上 编

| | |
|--------------------------|-----|
| 1. 知识分子的定义 | 1 |
| 2. 知识分子与大众 | 19 |
| 3. 知识分子与政治 | 43 |
| 4. 知识分子与批判精神 | 71 |
| 5. 我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构成和分布 | 93 |
| 6. 当代知识分子间的代沟 | 112 |
| 7. 我国脑体收入差距的历史变迁 | 133 |
| 8. 知识阶层权力地位的回顾与展望 | 156 |

下 编

| | |
|-----------------------|-----|
| 9. 理性的批判与选择 | 170 |
| 10. “皮毛理论”与知识分子 | 177 |
| 11. 知识分子与市场 | 183 |
| 12. 符号、书与知识分子 | 197 |

| | |
|----------------------|-----|
| 13. 书籍出版的历史与现状 | 215 |
| 14. 图书馆的社会学研究 | 231 |
| 15. 大学与知识分子 | 255 |
| 参考书目 | 271 |
| 后记 | 279 |

1 知识分子的定义

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

——歌德

一个概念被千百人亿万次地使用，并不说明这一概念已经具备了明确、公认、凝固的定义。概念形成是抽象思维的起点。不断重复一个不甚了然、含混模糊的概念，可以掩盖无知，但久而久之也使自己误以为认识了尚未认清的事物，从而陷于思维混乱，无法明确乃至深入地认识这一概念所包容和旁及的角色、事物和现象。相反，对概念作出科学定义本身就反映出对这一角色、事物或现象的一定深度的认识，同时定义的形成又促进这一认识过程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几乎在每一天的报刊上都可以十次、百次地见到它。但如果我们要问每一位读者，甚至使用者（无论是报刊撰稿人，还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府官员）：什么是知识分子？恐怕未必都能得到确定的答复，更不会得到一致的答复。更为遗憾的是，我国学者至今没有对之作出深入的探讨。多数人似乎觉得这不是问题。只有当他企图精确地定义它时，才会发现存在着那么多歧义、矛盾和混乱。

有知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吗？显然不是。知识人人都有。就自然知识而论，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些生产知识，没有一定的知

识作基础，是无法从事任何一项简单的生产活动的。就社会知识而论，习俗、礼节、法律、规范是每个人都懂得一些的，否则一个人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身，不能进行任何社会交往，享受任何社会生活。

如果不从知识而从职业角度考虑，可以提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吗？从我国社会现状看，也不是。比如，干部阶层是从事组织管理工作的。即使某些时期宣传上强调“干部参加劳动”，也不过是为了提高他们对基层的认识，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便于组织管理。从根本上说，干部的工作是需要很多知识的职业，其性质是劳心而非劳力的。但若把我国目前的干部都视为知识分子恐怕是绝大多数人难于赞同的。至少，干部阶层中相当比例的初中、高小文化程度者是难于算作知识分子的。

那么，具备了一些书本知识，即读书人，是否都是知识分子呢？在古代读书识字机会难得，读了书往往使一个人在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大大地有别于不识字的人。可是在现代社会中，文盲越来越少，初等教育日益普及。难道因此可以说：现今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了吗？这里起码又涉及一个尺度问题：读多少书才算知识分子？

从以上流行观点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仅从职业上不能划分，还要看知识素质；知识人都有，要看知识类型；对于具备了多少特殊类型的知识才成其为知识分子，要有定量的尺度。

一、知识分子的定义

一个科学上的理想定义应当既有理论的深度，又尽可能满足“操作”的要求。西方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布里奇曼（P. W. Bridgman）早已把“操作主义”的思想吹进了现代物理学

界。操作主义的思想对于社会科学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并不是物理学中的一切概念都可操作，也并非社会科学中的一切概念都不可操作。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比自然科学中的概念更难于定义和操作，但两者在要求定义尽可能清晰、准确、严密、深刻上是一致的。定义缺乏理论深度就不能帮助我们揭示一事物的因果性和其历史过程中的共性，不能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如果定义的对象不是抽象的精神体，定义却又完全没有操作性，就无法以之划分和把握现实中的人、物和现象，将失去实际价值，成为“玄学”。即使一时还下不出一个既有理论深度又可操作的单一定义，也无妨为之下一个理论定义，同时也下个操作定义，并使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使理论定义成为操作定义的基础，让操作定义为理论定义提供清晰性和准确性。我们愿意循着理论与操作、定性与定量两个目标，尝试着为“知识分子”下一个初步的定义。

我们的理论定义是：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社会生活中，在其工作、交往和表达时，比其社会中多数成员更频繁地使用符号象征体系和“一般性”的概念、范畴，即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符号象征体系可以是文字，可以是计算机语言，也可以是自然科学中的“公式语言”（如数学语言、物理学语言等等）。这些人频繁地使用这类符号和一般性范畴，首先在于他们具有这种知识和能力，同时又是因为长期的个人兴趣、专业学习及以后的职业要求所导致的，即一方面他们有这种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又确实在经常地使用着它（参阅 Shils 1968）*。与上述理论定义相应的操作定义是：现今的知识分子

* 括号中姓名为引文所在书籍（或参考书）的著者，第一个数字表示该著最初发表的年份，读者可根据这两者在书后参考书中查找该书全名及笔者使用的版本。如括号中有第二个数字，是表示引文所在的页码，下同。

是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

人类在早期的生产与生活中就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口口相传,随着生产生活的进一步社会化和复杂化,才逐渐产生了文字——第一种可记录的符号象征系统。文字其实不过是口语的记录。但正是这种可记载性使得文字与口语有了质的差别。创造文字的历史久远得难于考究了,但社会发展对于文字的需要,对于“文字阶层”——文士的需要,却是见证于各个民族早期历史的。有了文字才能记载发生和认识到的一切;才能把指令不走样地传达到远方,使统治建立在较大的地域上;才能把知识有效地传递给下一代,使得人类更牢固地站立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最初专门掌握文字的人——最初的知识分子,也因为掌握了一种特殊“语言”,而成为显赫的阶层——文士阶层。早期知识分子中虽然也不乏一些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学家,但当时知识阶层的主要符号象征系统是“文字”,主要社会功能是为社会提供“规范”(伦理与秩序)或从事管理。实际上当时生产领域中的知识更多地掌握在农夫、工匠手中。这些知识仍然是口口相传的,并且停留在感性的水平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才走入了自然科学和生产领域中。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们创造出一套套认识大自然的崭新的“语言”。依赖于这些“语言”,人们把对大自然的认识大大地推向深入,导致了社会生产的突飞猛进。

人人都有知识。知识分子的知识当然更多些。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知识差别还不仅仅在知识的多少——量的差别上,往往更在知识的形式——质的差别上。形式与内容的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一向是人类认识不断深化、能力不断提高的必经步骤。但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和根深蒂固的古代学术传统中,一贯轻视形式的发展。实际上,在人类认知的历史上,正是

“形式”的一次次更新而大大地促进了认识的扩展和深入。这种认知形式的本质变化，就是一种种新的符号象征系统、“新语言”的产生。

人类描述、预卜、思考、记载自然与社会的第一套符号象征系统是语言和文字。以后随着人类的认识向大自然的深度挺进，又形成了一套套自然科学的语言：数学的语言、力学的语言、化学的语言。20世纪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的发展又带给人们一种崭新的“电脑语言”。这一套套语言都是人类的思维模式和工具。掌握了这种种特殊语言系统的人就是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知识分子。

在古代，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知识上的“本质的差别”是文字；在近现代，是新的“语言”——自然科学语言、计算机语言等等。在古代掌握了文字系统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在当代，大多数人都掌握了文字，要么掌握了其他符号系统，要么具备更高文字造诣和掌握了更多人文学科知识的人才能称得上知识分子。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现象是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而人类的任何一种认知语言（无论口语、文字、数学公式、力学公式、计算机语言）都是有限、抽象的。以有限把握无限，意味着要从具体和个别中得到抽象和一般。这种探究自然与社会现象中“一般性”的兴趣根植在人类的自身存在中，潜伏在人的心理机能中。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诱发、驱动着这种兴趣和能力（虽然兴趣本身也是动力）。在探究中，这种能力不断发展。社会需要对于自然、社会的“一般性”作探究，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兴趣和条件去从事探究的。同时社会也供养不起大多数成员去从事这种探究。尽管多数社会成员主要在为衣食往行的满足而劳动，探究大自然中“一般性”的成果却不同程度地